

隨筆·觀察

從京都的「哲學之道」談起

● 王中江

生活給每個人留下的記憶，是不計其數的。它們大都處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中，一旦遇到偶然的刺激，就會湧現出來，使我們感到新鮮，並引發出更多的回味和聯想。

一次，我翻閱報紙，《光明日報》（1994年4月25日）上的一篇散文吸引了我。這篇散文的題目叫〈「哲學之道」賞櫻花〉，作者是日本京都大學的一位中國進修生。從題目就可知道，這篇散文講的是在「哲學之道」上觀賞櫻花的事。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日本諺語說：「花數櫻花，人數武士」，可以說，櫻花已成為日本文化的象徵。到日本的外邦人，如果趕上櫻花盛開的季節，恐怕都要去觀賞櫻花，感受一下這非同一般的日本自然風光。我在日本居留期間，當然也沒有錯過這種難得的機會，雖沒有從南方看到北方，但只就是東京的櫻花，就使我大飽眼福。所以，一提到在日本觀賞櫻花，我也很感親切。

不過，散文更引起我回憶的則是「哲學之道」。散文的作者是在京都的「哲學之道」上觀賞櫻花的，他特別鍾情「哲學之道」：

然而，我卻特別喜歡京都市東山腳下那條幽雅的散步道——「哲學之道」。

說不清是由於我的美學藝術專業與哲學有着不解之緣，因而一見到這冠以「哲學」之名的小路便倍感親切，還是由於這條小道本身的優雅風韻深深吸引了我，一有空，我往往就會信步來到這條離我所進修的京都大學並不很遠的「哲學之道」，從它的起點走到他的終點，再從它的終點走到它的起點。

但這位如此熱愛「哲學之道」的作者，在下文說的一句話卻令我愕然不已：「至於它當初為何叫做「哲學之道」，卻是無從查考了。」好一個「無從查考」，一下子就把「哲學之道」的歷史記憶和真實意義拋到九霄雲外。

實際上，要查考「哲學之道」的由來，易如反掌。如果你是一位旅遊觀光者，只要帶上一本稍微詳細的京都旅遊指南就可查到。散文的作者在京都大學進修人文學科，他就更有條件知道「哲學之道」的來歷。因為，「哲學之道」恰恰與京都大學一位教授的



西田幾多郎在1911年發表了《善的研究》，標示着日本第一個具有原創性的哲學體系的形成。

名字聯繫在一起，他就是日本近代著名哲學家西田幾多郎(1870-1945)。

一般認為，西田幾多郎是日本近代哲學從「移植」走向「創造」的關鍵人物，他的處女作《善的研究》就是這轉折的標誌。正如論者所說：「它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一個劃時期的事件。」在這本著作中，「明治伊始所接受的哲學，開始脫離單純的翻譯、介紹階段，而形成了依靠自己本身的思維來進行綜合與統一的主體」^①。說到具有創發性的「西田哲學」何以誕生，固然有諸多因素，其中尤與他對哲學的「投入」、與他在哲學中「體驗寧靜和思索」的生活密不可分。

從西田早年的人生經歷來看，他並不幸運。家道沒落，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被父親逼迫離婚，被解聘等等一連串的折磨，前後向他襲來。為了擺脫這些「不幸」的痛苦和紛擾，並尋求心靈的寧靜，好專心投入到哲學研究中，西田毅然「參禪」，並在東方的「禪」中獲得了智慧。1891年，他

在京都的妙心寺堅持了兩個月的「坐禪」生活，為的是要「斷絕妄念」。1903年，西田又在京都大德寺悟得了「真正的自我」。從1897年到1907年西田的日記中，可以發現他內心世界的「不安」和「參禪」的毅力。如1901年2月6日的一則日記說：

大丈夫任何事都要靠自己的力量，不可求諸他人。哲學也應擺脫功名等卑鄙之念，以自安己心為本，安靜進行研究，使之與自己的安心相一致。

總之，西田「參禪」的目的，就是要在世俗「噪音」面前保持安寧的心境，能埋頭於思索，以求在「精神」上達到超拔。《近代日本思想史》寫到^②：

他通過「禪」的修煉所追求的東西是「以任何懷疑也打不動、拉不動、搖撼不了的精神上的事實」。

的確，在西田任第四高等學校(位於金澤市)教授的十年中(1901-1910)，他逐漸達到了「不動心」的境界，體驗了寧靜和思索的生活，並形成了其以「純粹經驗」為核心的哲學思想。1911年出版的《善的研究》，就是他在這一時期哲學思索的結晶。在該書初版的〈序〉中，西田敘述了他的「思索」體驗：

進行思索的人，也許會被墨菲斯特利斯嘲笑為「猶如在綠色的原野上吃枯草的動物」。但是，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命裏注定罰我思考哲理」那樣，人們一旦吃了伊甸樂園的禁果，就不得不受這種折磨。

在〈新版序〉中，西田還回憶說：

費希特自己說過：有一天早晨，他坐在萊比錫玫瑰谷的凳子上休息，在春天晴朗的陽光下眺望着鳥語花香、群蝶飛舞的牧場，心中一反過去那種無聲無色的自然科學式的黑夜般的看法，而沉迷於當前現實的真實的白晝的思考。我不知受了甚麼影響，很早以前就抱有這樣的想法，即認為實在就是現實原樣，所謂物質世界也不過是從這種現實思考出來的。現在還可以回憶起我在高等學校學習時期，一邊在金澤市的大街上走着路，一邊像做夢似的沉緬於這種思考的情景。

1910年，西田被聘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任教倫理學。這樣，他就從金澤來到了京都，在此又展開了被認為是他思想發展第二個時期的思索。他說③：

來到京都以後，獲得專心讀書和思索的機會，使我的思想多少得到了一些洗練和充實。

離京都帝大不遠，在永觀堂北邊，從東山山麓的若王子神社到銀閣寺，有一條沿着疏水渠伸延的長約兩公里的南北小道，這是一條極好的散步之道。由於西田經常沿着這條小道一邊散步，一邊進行哲學思索，這條小道後來就被命名為「哲學之道」。

「哲學之道」不僅環境幽靜，而且風景怡人。在這條沿着疏水渠的小道上，有一排綿延不斷的櫻花樹。一到春天，樹上的櫻花競相開放，「哲學之道」就成了一條眼望不盡的櫻花道。這條道上的櫻花，被稱之為「關雪櫻」（「關雪」即橋本關雪，他是近代日本的著名畫家。他的作品《玄猿》、《寒山拾得》，蜚聲畫壇）。在櫻花盛開的

季節，關雪櫻的花瓣也會飄落疏水渠，覆蓋在水面上，隨着水流緩緩移動，這就形成了一道櫻花流。到了秋天，「哲學之道」則別有一番景致，放眼盡是鮮紅或紅裏透黃的葉兒（日本秋天的紅葉以京都附近的嵐山為最），使人流連忘返。正是在這紅葉的季節（1987年11月），我與日本朋友馬淵昌也先生、兵藤明美小姐一同到京都旅遊，那時我曾到過「哲學之道」，並拍下照片留念。

現在看看當時的照片，再回想一下，除了「哲學之道」上的風景讓我懷念外，哲學家在「哲學之道」上所體驗到的寧靜思索，更令我神往。至今仍與「人文」為伍的人，愈來愈感到被緊緊籠罩在周圍各種各樣的噪音中，外面世界的誘惑使人躁動不安、心神不定。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海德格爾（M. Heidegger）為甚麼要置身於一座山頂的小屋中，那裏「山峭谷深，空氣清寒；四周寧靜，罕見人迹：人到那種地方，隔世之感油然而起」④。顯然，海氏從現實世界中抽身，是為了充分地體驗寧靜和思索。柯克爾曼（J. Kockelmans）在其《馬丁·海德格爾：他的思想入門》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揭示⑤：

他不喜歡大城市及其生活方式。他怕熙熙攘攘的社會生活以及各種成規俗約會干擾他對重大哲學問題的獨創性思考。他表示渴望寧靜、沉寂、獨處；渴望對人、事物和環境的了解。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獲得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深刻的洞察和獨創性表達的時機。

同樣，我們不難理解中國古代何以有那麼發達的「歸隱」文化。

但是，生活給我們的壓力太大了，籌劃生存的「煩忙」，使我們忘記了應有的「自己」。用黑格爾所說的一段話來描述我們時代的精神處境也許更為合適⑥：

那些孤獨的人們，被他們的同胞所拋棄，被隔絕於世界之外，而以沉思永恆和專門獻身於這種靜思生活為目的——不是為了有用，而是為了靈魂的福祉，——那樣的人們消失了；……於是，在昏暗被驅散以後，也就是返觀內照的、幽暗無色的精神勞作消散以後，存在好像化為歡樂的花花世界了，大家知道，花沒有是黑色的。

由於外在的必須，由於時代興趣的巨大與繁多而無法避免的分心，甚至還由於日常事務的雜鬧和以糾纏於日常事務為榮的眩人耳目的虛妄空談，使人懷疑是否還有在沒有激動的平靜中一心從事思維認識的餘地。

面對此情此景而能臻至「不動心」的境界，對我們來說可能已成為更難達到的理想。今天，尋找「清靜」會被目之為「失落」，而不再會被認為是保持「高潔」；「投入」和「入世」，按理說更應與改造社會相聯繫，而現在則往往意味着「同流合污」。但現在「出世」似也不可能了，因為已無「世外」可出了。在這一點上，古人比我們幸運得多，他們很容易找到一片清靜的地方，隱而不現。而現在所有的空間卻已經被充滿和佔有。看來，我們現在只能是在「世」中而「超世」，只能是「視而不見」而「獨得獨樂」了。

最後，讓我們用黑格爾的話來告別精神上的不幸，並對未來哲學創造作出期望⑦：

愈徹底愈深邃地從事哲學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對外愈沉默。哲學界淺薄無聊的風氣快要完結。而且很快就會迫使它自己進到深入鑽研。但以謹嚴認真的態度從事於一個本身偉大的而且自身滿足的事業(Sache)，只有經過長時間完成其發展的艱苦工作，並長期埋頭沉浸於其中的任務，方可望有所成就。

註釋

①②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91），頁130；134。

③ 《善的研究·再版序》（商務印書館，1989），頁30。原版《善の研究·再版の序》（東京：岩波書店，昭和二十五年），頁5。

④ 俞宣孟：《現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爾的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55。

⑤ J. Kockelmans: *Martin Heidegger: A First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1965), pp. 55-56.

⑥ 黑格爾著，賀麟譯：《邏輯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頁2、21。

⑦ 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1），頁30。

王中江 1957年生，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從事中國思想史及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著有《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等，並曾發表論文三十餘篇。